

凉山州“团结话”量词探析

陈君兰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对凉山州“团结话”中的一个小类——量词进行深入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考察“团结话”中常用的量词并进行统计和比较,分析其与名词的搭配情况,然后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观察彝语、四川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在“团结话”量词中的体现,最后分析“团结话”作为中介语,在量词中体现的泛化与固化现象。

关键词:“团结话”;量词;分析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8)03-0073-04

An Analysis of "Unity Language" Quantifier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

CHEN Jun-l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in-depth study of quantifiers in Liangshan Prefecture's "Unity Language". Based on the fieldwork, the quantifiers used in "Unity Language" were examined,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 It analyzes its collocations with nouns, and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act, observes the influence of proverbs, Sichuan dialects and Putonghua in the quantifiers of "Unity Language". In the end, "Unity Language" is used as an interlanguage and the phenomenon of generaliz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reflected in the quantifiers.

Keywords: "Unity Language"; quantifier; analysis

“团结话”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所说的汉语,目前作为一种中介语而存在,其语音和语法规律大体同西南官话一致。但是由于受到本族母语——彝语、四川方言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影响,“团结话”因此产生了其独特的表达形式。量词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通过对量词的分析为我们探寻“团结话”的语法特点和变异提供了线索,也为我们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了解“团结话”这种方言的成因奠定基础。

“汉藏语系语言词类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量词。除藏缅语族有些语言(如藏语、景颇语等)量词还不太发达外,一般都有丰富的量词。量词的作用主要是表示事物的单位和动作行为的量。此外,许多语言的量词还兼表事物的类别、性状、级别等特征。”^[1]由此可见,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之一,虽然量词在基本词汇中出现较晚,但却十分丰富和完善。方言量词系统更呈现出更繁复的语用价值,在现代汉语里不能搭配的词组却在“团结话”中没有限制地使用。本文因此

将“团结话”与普通话、四川方言做比较,以显示出其独特之处以及受到普通话、四川方言与彝语三方面的影响的地方。

本文所用的调查材料为《凉山彝族“团结话”方言调查手册》中的450词条和120句子两个调查表中涉及量词的条目共21条,包括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种,均为生活中常见用语。通过对凉山州布拖、雷波、冕宁和盐源4县老年(>50岁)、中年(30~50岁)、青年(18~29岁)三个年龄段男女各2人的调查,得到他们量词的具体使用情况。以上发音合作者祖孙三代均为当地彝族人。老年、中年人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下且从未离开当地超过1年。青年人文化程度在本科以下,除在州府西昌读书时间以外也未离开当地。

一、“团结话”量词具体搭配分析

通过对调查表中的量词词条以及语法中涉及量词的句子的提取统计并分析,可以将“团结话”中的量词按照搭配的稳定程度分为三类。

(一)稳定的量词搭配

在四县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发音人语言事实的考察中,以下四类是最具稳固性并且没有第二种组合形式的搭配。例如:个+人;双+鞋(子);把+刀(儿、子);打一下。

(二)普遍稳定的量词搭配

区别于第一类完全固定的搭配模式,普遍稳定的量词搭配是在调查中存在大部分人的语用中,只有极少数(一位或两位)发音人会受到普通话、彝语或者四川方言影响而产生的而不同说法。例如:本+书;朵+花;块+布;头+牛;条+鱼;床+铺盖;骂一顿;去一趟。

在上述表达方式之外,这里举出一些与之不同的表述。例如:布拖老女阿酷么撒妞“个+书、个+花、个+铺盖”,雷波中男吉拿史日“张+被、张+布、个+鱼”,盐源老男安全才“个+鸡”。动量词方面有雷波中女张尔史“去一下”,冕宁中男沙金富“去一次”,冕宁老男卢金贵“说一下”等。

同一民族内认知的相对一致性是造成“团结话”量词搭配具有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同一语言社团在有相同地域环境和客观现实的地方共同生存,因此他们在思维认知方面也具有同一性。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过程,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是思维和认识的组织者。思维依靠语言来表达,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化的载体,是现实的抽象化^[2]。这是“团结话”量词系统内部出现高度统一的主要原因。

其次,凉山州彝族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和周围的汉民族接触而自主学习的,因此,成套地从外族语言中完全借用是最经济的方式。但是由于本族母语的深层影响,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搭配,还有普通话的全面推广也是造成与四川方言“不像”的最主要因素。

(三)不稳定的量词搭配

在“团结话”中,有一部分个体量词和名词的搭配使用是很特殊的而且种类繁多的。例如:支、杆、根+笔;道、扇、个+门;辆、个、架+车;口、隻、条、头、个、根+猪;隻、个、条+鸡。

动量词的使用上则见于“说一遍”“说一次”“说一回”“说一道”“说一下”等几种不同用法。

为更直观了解,因此将上述搭配用表格的形式呈现如表1所示:

上文提到思维的同一体性是相对的,而思维的差异性绝对是绝对的。洪堡特也曾有提到过“在同一语言

表1 不稳定的量词搭配

名词	量词	使用比例/%	名词	量词	使用比例/%
笔	支	66	门	道	39
	杆	29		扇	51
	根	4		个	9
车	辆	68	鸡	隻	74
	个	8		个	23
	架	23		条	3
猪	口	23	动词	量词	使用比例/%
	隻	8		遍	89
	条	14		次	1
	头	43	说	回	1
	个	8		道	8
	根	3			

中,这种特性和语音特性一样,必然受到广泛的类推原则的制约;而由于在同一个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3]思维的差异当然也存在于各个方言当中,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猪”这一事物是对应量词最多的,我们不妨以“猪”为例,可以看出不同的量词反映出说话人对“猪”的不同认知。熊仲儒(2003)认为这和猪的口部具有视觉显著性有关,他指出:“猪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其头部,它头部最突出的是它的嘴,故有‘一头猪’、‘一口猪’之说”^[4]。猪是过年和祭祀的必备之物,头部会被切下来祭奠祖先,因此用“头”来称量用法被普遍使用。“根”是典型的四川方言的表达方式,这里被“团结话”完全吸收,用于和“条”一样突出事物长条形的特征。“隻”是一个使用范围较广且发展很成熟的一个通用量词,但主要用于鸟类,这里却用来称量“猪”,不得不说是个特殊之处。“个”是使用最频繁最多的一个量词,用在此处可以看出说话人关注的点在于事物的整体性和个体性,但在普通话和四川方言中极少用于称量家畜,这也是“团结话”量词中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部分。

二、影响量词系统的因素

影响“团结话”量词系统形成的因素有很多,横断山区地理环境形成的天然阻隔,使得凉山彝族与官话区方言的人交流不如其他地区的人,因此在方言内部形成一套自己独有的量词体系。但是近年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各地区人民交流也日渐密切,所以彝语不再是影响“团结话”的主要因素,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四川方言在“团结话”中的表现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三个方面来讨

论影响“团结话”量词系统形成的具体表现。

(一)受彝语的影响

1. 语序

上文提到过,汉藏语系的语言几乎都具有十分丰富的量词,彝语也不例外。凉山彝语的语序与汉语不同,彝语将词作为序列的基本单位,放在句中相对固定的位置,从而实现表达彼此间的修饰与被修饰,说明与被说明,补充与被补充,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和目的。例如:汉语的量词短语的语序为“一块砖”“三代人”而彝语则是“砖一块”“人三代”。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这种受到彝语影响的典型例子——布拖老女阿酷么撒姐将调查表中的“一个人”表述为“人一个”。虽然极少,但是我们仍然十分看重这一现象。

2. 目的语过度泛化

目的语过度泛化在这里主要体现在对汉语庞大的量词数量和量词使用的复杂性的不完全掌握而产生的对汉语量词习得的干扰,是语法的过度类推,忽略量词语义的表达功能。

在彝语中的名量词中,泛用量词[ma³³],[tɕi³³]可以囊括很大的范围,[ma³³]一般用于无特别性状的人,但此时只和数词“一”“二”搭配,还可以用于无生命的个体,动物和一些没有明确形状的事物或有大致圆形、颗粒性和块状的事物。例如:

tʂo³³ ɲi³¹ ma³³

人 二(量)

vo⁵⁵ sɔ³³ ma³³

猪 三(量)

o³³ khu³¹ ma³³

枕头(量)

tʂo³¹ tsɿ³³ ma³³

桌子(量)

tʂo³³ ma³³ tʂɿ³¹ tʂu³¹ ɣu³³. 每个人得一碗。

人(量)一 碗 得

[tɕi³³]通常用来表达贬义或者是身形较长的动物,有角的动物,高大的动物或者非生命的事物。

tʂo³³ tɕi³³ (带侮辱语气地说“一个人”)

人(量)

tshe³³ tɕi³³

麂子(量)

lu³³ tɕi³³ thi⁵⁵ dzo³³. 这儿有一条牛。

牛(量)这儿有

从上面的彝语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若将彝语进行对应的汉语翻译,对应的汉语量词有“个、口、座、栋、块”,但在彝语中也只是用[ma³³]一个语素,而[tɕ

i33]使用的范围虽然相较于[ma³³]稍微窄一些,但是也能在生活中广泛使用,可以翻译为“个、头、把、根”或一些别的量词。彝语与汉语相比名量词对应的差异与二者量词系统的编码度差异相关。汉语在对一般名词进行称量时倾向于——对应或者一个量词对应两个名词,而彝语则不然,它虽然有个体专用的量词,但在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倾向于使用[ma³³],[tɕi³³]两个个体量词对应多个名词。从这个角度分析,“团结话”在量词系统的语义域编码度比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四川方言的量词系统的语义域编码度低一些也就有理可循,最为普遍的情况是量词“个”的泛用,如表2所示。

表2 量词“个”的泛用情况

示例	“团结话”	出现次数
本+书	个+书	1
朵+花	个+花	4
扇+门	个+门	3
床+铺盖、被子	个+铺盖、被子	1
口+猪	个+猪	3
隻+鸡	个+鸡	8
辆+车	个+车	3
条+鱼	个+鱼	1
头+牛	个+牛	1

不论是普通话还是凉山彝族人接触最多的四川方言都不会出现量词“个”如此高频率对应个体名词的情况。这和语言学家马丁内提出的经济性原则是一致的,他认为,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体现出人们有效交际的需要和与生俱来的生理、精神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尤其是在口语方面,口语不强求精确、生动形象地表达,只需要能更省时省力和便捷即可,这便让母语为彝语的凉山彝族在说话中往往选择更方便的词,尽管这个词表意模糊的,但是大体不影响交流。其次,量词本身的特殊性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吕叔湘先生就认为“‘个’只是个填空子的单位词”。它的主要功能是称量而对于表现事物的形态特征只是起辅助作用,因此在和名词搭配时完成自身实现语言表达需要的结构任务即已经足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更好地适应了口语交际。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年龄对于“个”的选择也有影响。青年人使用“个”的频率十分低,在调查中仅仅只出现4次。这和受教育程度、与外界接触程度有很大的关联。

3. 无对应说法

没有对应说法的词条是指在调查中发音合作

人不会用汉语表述的词条,但这种情况只出现于布拖县而且只有三处,分别是老男阿子日尔“一扇门”,青男跑差科子“一扇门”“一块布”。

(二)受四川方言的影响

四川方言是凉山彝族人接触最多的汉语,彝族人一开始学习汉语时绝大部分都是从模仿四川方言开始的,因此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四川方言特殊的表达方式,例如:杆+笔、根(儿)+笔;道+门;架+车;一根猪。动量词的部分有:说一道。具体情况见表3所示。

表3 四川方言量词使用情况

示例	“团结话”	出现次数
支+笔	杆+笔	21
	根(儿)+笔	3
扇+门	道+门	13
辆+车	架+车	8
口+猪	根+猪	1
说一遍	说一道	6

我们从这些量词中可以看出浓重的四川方言特色。“根”是四川方言相较于其他方言不同的地方,作为量词可以用来称量细长的东西、家养牲畜、植物等事物,“一根猪”是其中很典型的表达方式,虽然在“团结话”中的表现不多,但是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线索。值得一提是,“一架车”这样的表述,是由于以前四川地区比较常见的是木板做的由人力拉的两轮车,被称为“架架车”,后来被引用到其他车辆身上。“架”在做量词时,也可以用于船只、山和床铺,例如:一架船、一架山、两架铺。

(三)受普通话影响

由于国家施行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政策,加上近年来交通大力发展,凉山州与外界天然的地理屏障被逐渐消除。加上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凉山彝族人可以从电视、广播、网络等各方面接触到四川方言以外的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话则是其中占比最大的。所以“团结话”中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借用普通话的表述,例如:一张被;一张布;一口猪;说

表4 普通话量词使用情况

示例	“团结话”	出现次数
辆+车	辆+车	24
扇+门	扇+门	17
床+被	张+被	1
块+布	张+布	1
口+猪	口+猪	8
说一遍	说一次	4
去一趟	去一次	1

一次;去一次等,可见表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普通话和四川方言在量词使用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去一下;说一下等。我们不能将量词完美切分开并指出哪些是在四川方言影响下形成的而另一部分是在普通话影响下形成的,这样做有失严谨,所以我们只能找出一些明确不存在于四川方言而存在于普通话中的表述看出普通话在“团结话”中的身影。

在普通话中,“张”可以用来称量能卷起或能展开的东西,但却不能和“被子”组合成合乎规范的词组。但是在“团结话”中我们却发现了这样的用法,可以看出是发音人过度类推造成的,认为所有像纸一样可以平铺的或卷起的事物都能用“张”这一量词。“次”是四川方言中没有的量词,一般普通话用“次”的地方,四川方言都会用“回”“道”“遍”来表述。四川方言也无用“口”来称量家畜的组合,一般的家畜只会和“根”“头”或“条”等量词搭配。

三、“团结话”作为中介语的特征在量词中的体现

“团结话”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语言介于彝语和汉语之间,随着彝族与汉族交流日渐密切而不断完善和提高,并且逐渐向汉语靠拢。“团结话”作为中介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是泛化与固话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同样体现在它的量词系统之中。

(一)泛化现象

凉山彝族在学习汉语时常常会把新的语言规则当成普遍规则来使用,将汉语的语法进行简单化处理,从而创造出一些自己独有的组合,尤其是遇到汉语庞杂的量词系统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显得尤为突出。例如上文提到的量词“个”的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不影响口语交际的基础上,选择最为经济的表达方式,因此产生泛化现象。除了“个”,另一个泛化现象就是量词“张”的过度类推,虽然在“团结话”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这一现象。

(二)固化现象

Selinker(1972)在《中介语》中提出:许多(95%)外语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会出现固话,使其语言能力不能达到本族人的同等水平。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表达受到母语的影响,母语的语法规则会倾向于保留在与目的语相关的中介语之中,不受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前面提到的“个”等量词的泛化,在“团结话”中已经逐渐稳定,广泛地用于彝族人的日常交流中,也会直接传递给下一代,因此形成固化。

参考文献:

- [1] 孔捷.从平等到卓越——德国大学卓越计划评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0(3):54-56.
- [2] 王琦,程莹,刘念才.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目标[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86.
- [3] 刘宝存,张伟.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6(6):1-7.
- [4] 李永婷,徐文彬.试论德国大学卓越计划的得失及其对我国高校改革的启示[J].高等理科教育,2017(1):57-63.
- [5] 朱佳妮.追求大学科研卓越:德国“卓越计划”的实施效果与未来发展[J].比较教育研究,2017(2):46-52.
- [6]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4-05/05/content_2671258.htm.
- [7] 宋俊成,宋向楠.整体转型:一流学科建设的制度逻辑审视[J].现代教育管理,2017(8):31-34.
- [8] 罗向阳.“双一流”建设:误区、基点与本土化[J].现代教育管理,2016(10):12-16.
- [9] 张新科,刘轶.从均衡发展到追求卓越——德国高等教育“卓越计划”评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1(9):100-104.
- [10] 张武军,谢辉,乔兰,等.德国大学“精英计划”及对我国“985工程”的启示[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2.
- [11] 赵俊芳,王海燕.德国大学卓越计划的制度实践[J].外国教育研究,2014(11):81-90.
- [12] 别敦荣.论“双一流”建设[J].中国高教研究,2017(11):8-14.
- [13] 邬大光.重视本科教育: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J].中国高教研究,2016(6):5-10.
- [14] 马陆亭.“双一流”建设不能缺失本科教育[J].中国大学教学,2016(5):9-14.

(上接第76页)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从组合关系和语言接触两个方面对“团结话”量词进行研究,总结出其搭配特点。在名量词对应上“团结话”更倾向于一个量词对应多个名词,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自然地理因素和认知上的差异。从语言接触上来看,“团结话”分别受

到彝语、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三方面的影响,分别表现在语序、目的语过度泛化、没有对应的说法及四川方言和普通话的特色表述中,受到母语以外的语言的影响和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本研究并没有完全穷尽“团结话”中的所有量词,语言总是在不断变化。但笔者期望通过对这些量词的考察,让“团结话”相关的研究更有归纳性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季羨林.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57-157.
- [2] 曾素英.中西思维方式与语言逻辑比较[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7(4):114-117.
- [3] 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 牛巧红.量词“口”“头”“只”的系源研究及认知分析[D].郑州:郑州大学,2007.
- [5] 王文虎,张一舟.四川方言词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
- [6] 丁椿寿.彝语通论[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 [7] 郭熙煌.语言认知的哲学探索[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8] 普忠良.纳苏彝语语法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6.
- [9] 步连增.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量词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1.
- [10] 石美珊.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口语词汇问题[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2(3):82-86.
- [11] 胡素华.彝语诺苏话中光杆名词和名量短语的指称性[J].语言学论丛,2012,45(1):231-246.
- [12] 胡素华,沙志军.凉山彝语类别量词的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4):120-124.